

不只是茶壺裡的風暴？初選分歧的大選效應

楊婉瑩*

摘 要

政黨提名階段的黨內分歧對於大選有何影響？本研究認為兩者之間存在連動的關係，對大選的「選舉預期」將會影響政黨提名時的「黨內分歧」，而提名的「黨內分歧」連帶影響了大選結果。「選舉預期」指的是大選勝算機會的心理推估，乃是連結並同時影響初選黨內競爭以及大選黨際競爭的關鍵因素。選舉預期由兩個因素構成，包括「現任者優勢」對黨內競爭的嚇阻效果，以及選區「政黨優勢」對黨內競爭的磁吸效果，這兩種不同原因導致的黨內競爭，都對大選有著正向的影響。本研究分析第八、第九兩屆立委選舉之政黨提名與大選資料，發現兩大政黨在提名階段的黨內分歧受到不同因素影響，而對大選產生不同作用。對國民黨而言，現任者從初選到大選似乎並無明顯的「選舉預期」優勢，也沒有產生「嚇阻」黨內分歧的效果；反之，政黨的選區優勢則有著「選舉預期」優勢，既刺激了初選的黨內競爭，也提高大選的得票率。相對地，民進黨的現任者具有「選舉預期」優勢，有效嚇阻黨內競爭，較少面對黨內挑戰；而在大選階段，未被黨內挑戰的現任者（選舉預期優勢）相對於面對黨內挑戰的現任者（選舉預期劣勢），在得票上亦處於相對優勢。由本研究的理論推論與資料分析結果可見，政黨提名階段的黨內競爭，絕對不僅止於黨內的風暴，更是預示著大選競爭的諸多玄機密碼。

關鍵詞：選舉預期、初選分歧、現任者優勢、政黨優勢、嚇阻與磁吸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Email: wyang@nccu.edu.tw

收件日：2020 年 1 月 1 日；修正日：2020 年 8 月 11 日；接受日：2020 年 10 月 24 日

Not Merely a Storm in a Teacup? The Electoral Effect of the Primary Division

Wan-Ying Yang*

Abstract

What is the impact of the primary division on the electoral outcom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se two exist the linking causal relationship. The electoral prospect affects the primary division (intraparty competition), and the primary division affects the electoral outcomes. The electoral prospect, the psychological calculation on the winning prospect of the election, links and affects the primary division and the electoral outcome. And the electoral prospect was composed of two elements—the incumbency advantage deterring the primary division and the party stronghold magnetizing the primary division, combined together lead to positive electoral outcomes. Analyzing the primary and electoral data of the 8th and the 9th term legislative elec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intraparty and interparty competition of the two major parties were affected by different factors in the primary and the final election. For the Kuomintang (KMT), the incumbents not having winning electoral prospect, neither deter the intraparty competition nor win over the interparty election. By contrast, the party strongholds with the winning electoral prospect increase the intraparty competition and lead to the electoral victory. For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the incumbents with higher winning electoral prospect, deter the primary division and have a higher chance of winning the election compared to those incumbents with lower winning electoral prospect and facing primary divisions. Inferring from the theories and data analyses, the primary competition and division during the party nomination is not merely a storm in a teacup, it actually connotes a mysterious code for the electoral interparty competition.

Keyword: Electoral Prospect, Primary Division, Incumbency Advantage, Party Stronghold Advantage, Deterrence and Magnetizatio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wyyang@ncc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2020.1.1; Revised: 2020.8.11; Accepted: 2020.10.24

壹、前言

2019年3月18日賴清德宣布參加總統大選的民進黨黨內初選，自臺灣總統民選以來，相對於過去現任總統都獲得政黨直接提名，這是尋求連任的現任總統首次遭遇到黨內初選挑戰。經歷諸多黨內紛爭與外部（美中臺港）因素，蔡英文聲勢大升，獲得民進黨總統大選的提名。賴在相關訪問中，表示促使其參選主要原因就是「黨內普遍的失敗氛圍」，民進黨自2018年九合一地方大選慘敗後，基層有很深的焦慮，擔心民進黨總統和立委選舉可能會輸掉（今日新聞編輯中心，2019：今日新聞）。雖然初選三個月前後外部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賴的參選不啻是發出警訊，現任者的聲勢已經下滑，黨內的挑戰乃是因為預期現任者的選舉劣勢而來。

立委選舉也不乏類似案例，原本預期擁有連任優勢的現任者，在黨內提名階段遇到黨內同志的挑戰。在第八屆立委選舉時，臺北市第四選區現任者蔡正元在黨內初選受到挑戰，雖經過民調競爭最後被提名，但是得票率從上屆的62.25%降到本屆的48.22%。高雄市第九選區的現任者郭玟成亦在提名階段被黨內同志挑戰，即使經過黨內民調之後被黨提名，最終大選仍然落敗。第九屆立委選舉，桃園市第四選區現任者楊麗環，以及臺中市第四選區現任者蔡錦隆同樣遭遇黨內挑戰，雖經由內部民調後獲提名，但最後大選仍敗選。類似的情節似乎暗示，當現任者在黨內提名遭遇到挑戰時，現任者的勝選行情下降，可能在黨內提名時就被刷下，也可能被提名但輸了大選，即使最終於大選勝出，也可能會在大選階段經歷辛苦的一戰。

當然這些是部分案例，不足以概全，也有不少現任立委在黨內提名遭遇挑戰，最後仍然連任。例如第九屆立委選舉，臺南市第一、二、三選區民進黨提名現任者面對激烈黨內競爭，最後仍能以高票勝選。這些選區通常是政黨鐵票區，即便是現任者也難免遇到黨內挑戰，畢竟在政黨鐵票區贏了初選就有極高大選勝算。2018地方縣市首長選舉中，某些縣市甚至有所謂「某個黨推個西瓜出來選舉都會當選」的說法（邱瀨唐，2017），這種「西瓜說」意味著政黨在某些選區具有高度優勢，特別現任者出缺的情況下，初選往往打得比大選激烈。這些案例似乎暗示著，黨內競爭對現任者而言，可能是一記警訊，但是若現任者同時身處在所謂的政黨鐵票選區（例如臺南之於民進黨），也就是政黨優勢選區（party stronghold），初選階段的黨內競爭則不盡然是負面影響，當選區政黨優勢強過現任者優勢，黨內競爭也可能預告大選有很高的勝選機會。黨內

競爭分歧的原因，究竟是因為現任者優勢下滑，或是因為優勢選區吸引角逐者眾，對於大選勝選的可能有不同的影響。

這些案例點出幾個關鍵問題：當現任者在提名階段面對黨內挑戰，是否意味著已經失去勝選優勢？現任者優勢下滑導致黨內初選的分裂，是否將不利於大選？如果候選人所屬政黨在其選區具有政黨優勢，即使提名黨內競爭激烈，是否仍對大選不利？更根本的問題在於：黨內提名階段，黨內競爭與分歧的原因為何？黨內提名的政黨內部分歧究竟預告的是大選的機會，還是風險？又，黨內分歧是否會影響大選結果？這些現象與問題都指向一個重要的推論：在政黨提名階段，政黨內部的分歧與競爭，不僅只是茶壺裡的風暴，不僅對大選有著重要的預示意涵，甚至可能外溢到大選的結果。

自2005年憲改之後，臺灣立委選制由舊的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under multi-member-district, SNTV-MMD) 轉向單一選區多數決 (plurality with single-member district, SMD) 與比例代表混合制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MMM)，至今已經歷三屆立委選舉。在新選制之下，政黨內部競爭以及黨際外部競爭出現何種變化，兩者又有何關聯，值得觀察。在區域選舉部分，過去在舊制複數選區多數決制下，同一選區多位當選者，使得在大選時容易出現同室操戈，黨內與黨際競爭並存於大選的情況。在新的單一選區多數決制下，黨內競爭與黨際競爭區分為兩個階段，黨內競爭將提前到政黨提名初選階段，大選階段則主要是黨對黨的黨際競爭。而初選與大選的競爭，是否相關？有何關係？則有待研究加以探究。

既有探討初選黨內分歧對大選影響的跨國研究，有所謂初選懲罰論或是紅利論者：初選紅利論者認為初選黨內競爭越激烈越能汰劣擇優，有利於大選勝選 (Carey & Polga-Hecimovich, 2006; De Luca, Jones, & Tula, 2002; De Luca & Venturino, 2017; Hogan, 2003; Ramiro, 2016)。初選懲罰論者則認為，初選的分裂造成資源消耗，不利於黨的團結，不利於大選 (Kenney & Rice 1984, 1987; Lengle, 1980; Lengle, Owen, & Sonner, 1995; Southwell, 1986; Ware, 1979)。這些理論都傾向將初選和大選之間視為單向的因果關係。相較之下，本研究認同 Lazarus (2005) 的理論，認為政黨提名時黨內分歧和大選競爭兩者有著雙向且連動複雜的關係，對大選的「選舉預期」將會影響初選的「黨內分歧」，而初選的「黨內分歧」也會連帶影響了大選的「黨際競爭」結果。亦即，「選舉預期」乃是同時連結了初選的黨內競爭以及大選結果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更進一步指出，選舉預期指的是大選勝算機會的心理推估，由「候

選人」和「選區結構」兩因素構成：候選人條件指的是在單一選區多數決制下具有優勢的現任者，是否擁有較高的「選舉預期」，而能在政黨提名階段有效嚇阻黨內競爭，並影響其是否能在大選中勝出。選區結構條件則指涉當政黨在特定選區擁有優勢，該選區是否會因為較高的「選舉預期」，而使得初選面對更多的黨內競爭，而此種黨內競爭亦可能有利於大選的勝利。

本研究將分為以下幾個部分進行討論。本文第二部分將由文獻理論與既有實證研究來回顧，政黨提名階段的黨內競爭如何牽動大選黨際競爭的輸贏。第三部分將提出主要的理論與假設，本文認為候選人對大選的「選舉預期」影響了政黨初選的「黨內分歧」，也會連帶轉化為大選的輸贏。而這個「選舉預期」主要取決於候選人（現任者優勢）與選區（政黨優勢）條件，不僅影響了黨內分歧，也連帶地影響了大選結果。第四部分為資料分析，透過彙整第八與第九兩屆立委選舉的提名階段與大選競爭相關資料，來檢視影響黨內競爭的因素，進而討論黨內競爭對於大選的影響，並透過模型化加以檢證本文的主要理論假設。

貳、政黨提名的黨內競爭與大選的關係

政黨提名乃是政黨內部競爭最關鍵的過程，通常也反映出政黨的特質並影響政黨政治的運作 (Rahat & Hazan, 2001)。Key (1964: 383) 指出初選不只是選擇候選人的提名方法，本身就是選舉。Pesonen (1968: 348) 認為政黨提名選擇比後階段大選的選擇更為重要，因為「提名階段會刪除了99.96%的所有合格候選人的機會，選民只剩下0.04%的選擇權」。Rush (1969: 4) 更是直接指出「選擇人選等同於選舉」。雖然過去研究普遍關注在大選階段，但是關鍵性的決定往往是在提名過程被決定，政黨提名的選擇 (selection) 與大選的選舉 (election) 經常是密不可分的兩個過程，政黨提名和大選之間，存在著連動的關係。

本文關切的是政黨提名的「黨內競爭」對大選「黨際競爭」的影響，相關文獻討論多簡化為「初選」對「大選」的影響。「初選」(primary) 廣義為大選之前的選舉／選擇，與「政黨提名」(nomination) 概念相混，在文獻與相關報導引用時兩者經常交互使用。然嚴格來說，政黨提名包含了各種不同方式（集權或分權，黨菁英或民主決定），初選僅是政黨提名時解決內部分歧的特定方式，然而一旦政黨提名採用初選，幾乎等同於宣告黨內存在分歧（若無分歧則無需初選），也使得初選幾乎等同於政黨提名的黨內分歧。初選將提名的黨內

競爭檯面化，使得黨內分歧可被觀察測量，而初選的內部競爭在大選的外部效應，已有不少的研究討論（特別是美國研究）。本文關注的是政黨提名的黨內分歧的大選效應，參考初選對於大選的影響等研究，可以探尋兩者之間普遍性的邏輯因果關係。

盛行初選的美國相關研究顯示，黨內競爭性初選是否有利於大選，有兩種主要觀點：一是所謂「初選紅利」(primary bonus) 觀點，另一個則是「初選懲罰」(primary penalty) (Carey & Polga-Hecimovich, 2006)。「初選紅利」論認為開放競爭性的初選有利於大選獲得選民支持，使得候選人選擇過程更加開放透明公開，也能夠更有效地區辨候選人是否受到選民的支持，對於大選具有預備性以及預測性的作用。初選也能有效平息內部紛爭，找到一個化解內部歧異的工具，提升黨提名的正當性。反之，「初選懲罰」論者認為，初選的選民以及選舉過程都不同於大選，就選民結構來說，初選選民和大選選民不同，相對於其他黨內菁英提名方式，參與初選選民較為短視，容易吸引極端意識形態的政黨支持者。就提名過程而言，分歧初選除了經費的消耗之外，激烈初選會使得最後被提名候選人元氣大傷，黨內的攻擊不利於內部團結，初選落敗者不會幫助同黨初選勝選者進行選戰操作，更可能使得同黨票源分裂，初選落敗者的支持者也不願投票支持 (Bernstein, 1977)。

初選對大選的影響，實施初選經驗最豐富的美國，相關經驗研究結果相當不一致。早期研究並未發現初選黨內分歧的負面效果，例如Hacker (1965) 針對1956 ~ 1964年間州長與參議員選舉研究，透過比較控制了現任者以及州的政黨優勢之後，競爭性初選對大選沒有負面影響，他認為真正影響大選的因素是在位者優勢與州的政黨結構。Piereson & Smith (1975) 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結論，初選分歧對於大選影響極為有限，兩者並無系統性連結。然而，Bernstein (1977) 再次檢視Hacker資料，觀察美國參議院在1956 ~ 1972年間的初選研究指出，現任者優勢與政黨優勢因素都控制之後，分歧的初選對於大選還是有負面影響的。針對不同層級選舉也有不少支持初選懲罰論，這些研究認為激烈黨內初選將使得黨內分裂惡化，以及負面選舉會使得輸了初選的候選人支持者不容易轉向支持初選勝選者，對於大選不利 (Kenney & Rice, 1984, 1987; Lengle, 1980; Lengle et al., 1995; Southwell, 1986; Ware, 1979)。然而，後續的研究結果持續挑戰初選懲罰論，例如Atkeson (1998) 控制了總統大選的候選人品質與在位者政黨的因素之後，發現初選分裂對總統大選影響有限，或Hogan (2003) 檢視1994 ~

1996年間九個州的議會選舉，發現初選分歧雖會影響大選，但是和多數研究認知不同，初選越分歧大選得票率越高。

在初選紅利論與懲罰論的辯論中，研究者也開始懷疑這樣簡化的因果推論，並提出修正理論：對於現任者與挑戰者兩者，競爭性初選對大選的影響有不同效果。最早提出這樣的觀察者可推Born (1981) 的研究，他對多年國會初選與選舉的經驗研究結果發現，現任者經歷激烈分歧的初選往往不利於大選，而對於非現任者的大選影響並不顯著，因為現任者在激烈初選中容易成為主要攻擊目標，不過該研究認為即使是對現任者的負面影響也有限（得票少些但不會輸），不會影響政黨席次輸贏。Romero (2003) 對國會選舉研究的批判性回顧也指出，過去對於初選分歧和大選投票之間因果推論很多是虛假關係，因為有諸多因素並未加以控制，透過將多年投票資料整合的模型控制，他的研究結果顯示，分歧性初選的影響是不對稱的，對現任者有負面影響，對挑戰者則無。分裂的初選對於大選的影響，和候選人為現任者與否，有著密切的關係。

對現任者而言，已有不少研究發現競爭性初選對其大選有不利的影響 (Abramowitz, 1988; Bernstein, 1977; Segura & Nicholson, 1995)。一般而言，現任者通常具有勝選優勢，若仍然面對黨內挑戰者，意味著現任者表現相對弱勢。Johnson, Petersheim, & Wasson (2010) 指出對現任者提名時採用初選，形同認知到現任者的劣勢 (perceived vulnerability)，會對現任者名聲不利、花費更多成本浪費財務資源。而在初選過程，現任者很容易成為箭靶標的，同黨同志的負面選戰 (go negative) 會打擊現任者聲勢並曝露其政治弱點，不僅疏離初選落敗者的支持者，不利團結，也會使得其在大選中選票流失 (Born, 1981; Stone & Maisel, 2003; Johnson et al., 2010)。相對地，基於最適者生存效應 (survival-of-the-fittest effect, political Darwinism) (Born, 1981: 661; Ware, 1979)，挑戰者所屬政黨辦理的初選，反而將提升其在大選的競爭優勢。挑戰者在初選所需的選舉技巧如募款、動員以及與選民聯繫等，都可以直接移轉到大選時派上用場，且初選會提升挑戰者候選人的選區知名度，有利於募款。初選歷經負面選戰等同於讓挑戰者事先消毒，最終於正式大選時，負面選戰對其影響就會降低 (Alvarez, Canon, & Sellers, 1995; Johnson et al., 2010; Ware 1979)。

從比較政治的角度來看，美國黨內提名過於依賴初選，甚難比較不同提名方式所反映的黨內競爭對大選的影響。歐洲國家採用初選相對較少，但也認為初選的黨內競爭有重要影響。Indriðason & Kristinsson (2015) 研究指出冰島採

用初選制度由來已久，觀察1970～2009年初選的資料，該研究指出採用初選對於其民主正當性有正面效益，不論是提升黨的包容性、黨的內部團結、多元代表性，初選都發揮了制度性的正面效果。當然也有研究對初選的黨內競爭提出疑慮的，對法國與義大利的總統與國會大選研究指出，左翼政黨（法國的社會黨與義大利的民主黨）採用初選，投票率越高越有利於大選，但競爭越激烈則可能不利於大選，惟整體投票率的正面影響大於競爭率的負面影響 (De Luca, & Venturino, 2017)。Ramiro (2016) 研究西班牙政黨提名，指出社會黨是唯一採初選決定政黨候選人的主要政黨。然而，考量到人們對政黨菁英的不信任，以及初選可能引發黨內衝突的擔憂，因此也並非全面性採用，社會黨採用初選經驗對地方選舉有部分正向效果。

在許多新興的民主國家如拉丁美洲與非洲國家，初選成為越來越受歡迎的政黨提名機制。拉丁美洲的一些研究發現，初選的黨內競爭對於大選有正面的效果 (De Luca et al., 2002; Serra, 2011)。Carey & Polga-Hecimovich (2006) 認為對於新興民主國家而言，初選有助於獲取選民支持，選民對政黨較不信任也討厭從密室協商出來的候選人，初選等同為候選人蓋上了民主的章 (“democratic seal of approval” on nominees)。除此之外，初選選民可能比政黨更能挑選出多數選民青睞的候選人，有利於大選階段獲得選民支持。初選有助於政黨達成共識，為菁英與派系之間提供一個公平提名候選人的機制，有助於派系和解，具有正面效益。Ichino & Nathan (2013) 則是認為新興民主國家，特別如買票和派系盛行的迦納，初選與其說是解決黨內競爭，不如說是具有分配好處 (patronage) 給地方黨員建立連結的功能，並據此提出建立在交換關係上的新初選理論。初選雖然具有交換協調功能，但是在黨內競爭的衝突會仍會對大選造成不利影響，對於執政黨而言，在競爭性初選中敗選者，會以不支持甚至脫黨參選來威脅候選人給予好處補償，對大選是不利的。對於在野黨而言，初選投入資源較有限，黨內的紛爭也較不嚴重，因此初選反而對在野黨是有利的。亦即，初選所引發的黨內競爭利弊，仍是因黨而異。

上述研究雖多從初選的討論切入，因初選最能直接反映並測量出黨內的競爭分歧，然本文主要關切的焦點為提名過程的黨內競爭對於大選究竟有何影響？臺灣自民主化面對選舉競爭以來，兩大政黨不斷持續更新其提名遊戲規則，試圖化解黨內提名紛爭。然而，即使透過不同的提名規則來因應黨內的競爭，這些黨內競爭過程仍將可能對於大選產生重要影響，這也是本研究試圖進一步探問的課題。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主要問題是政黨提名階段「黨內分歧」與否對大選的影響，並非「初選制度效應」。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關切的

是政黨提名過程是否存在黨內競爭，並非初選制度本身。相關討論很容易將兩者混雜，可能原因在於「初選」一詞，在比較不同國家時的挪移誤用。如前述所言，美國研究關切主要為，在多數舉辦初選的前提下，為何有的初選有高分歧，有的初選有低分歧，其中已預示了一些重要訊息，如候選人現任者以及選區優勢等特性，將影響到大選的結果，其他國家研究討論的則是初選的黨內競爭的意涵與不同影響。在臺灣，政黨提名採用多種策略，不同的提名策略經常反映了黨內的競爭狀態，本文關切的也不是這些提名方式本身，而是不同的提名方式所反映的「黨內競爭」狀態，經常夾帶了大選的重要的訊息爭點，後文將有更多論證說明。

參、理論與假設建構

本研究試圖解釋兩個問題，政黨提名的黨內分歧與競爭，受到哪些因素影響？政黨提名的黨內競爭對於大選又有何影響？黨內提名與大選看似為分開的兩個階段，但是兩者之間存在連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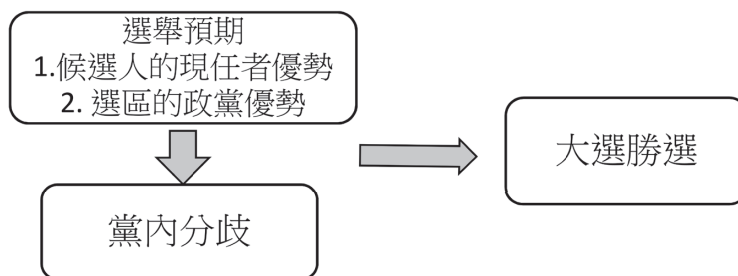
既有研究關於初選黨內分歧對於大選的影響，已有不少相關文獻的探討，然而結論不一。初選紅利論者認為越多的競爭能汰劣擇優，有利於大選。初選懲罰論者則認為，初選的分裂造成資源消耗不利於黨的團結，有礙大選的勝選。這些正反二元的論點受到挑戰，修正論者指出初選分裂的效果對於現任者和非現任者的效果並不相同，並透過相當多的經驗研究來論證。本文檢視文獻的爭論，特別認同Lazarus (2005) 的修正論，該研究試圖透過賽局推估將之理論化，他認為現任者面對初選的黨內競爭，之所以會降低其在大選時的得票率，不是因為現任者優勢的「直接影響」，如大選時的資源耗竭或是聲譽損害或是不利於團結等，而是因為候選人的「選舉預期」(electoral prospect)。在初選階段，挑戰者之所以投入初選，是因為觀察到現任者表現不佳、競爭力衰弱，才會投入初選，使得初選黨內分裂。初選的分裂只是一個非預期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真正的影響原因是候選人的「選舉預期」(Lazarus, 2005)。

本研究也認為，不論是紅利論者或是懲罰論者，都簡化了提名的黨內分歧與大選的關係，將之視為單向的因果關係（初選影響大選），兩者之間應該是雙向的關係（對大選的預期也會影響初選）。本研究同意修正論者Lazarus (2005) 等所言，政黨提名黨內競爭和大選的黨際競爭關係是雙向的，初選中的競爭者會預先考量大選中的勝算，再決定是否參加初選，也就是政黨提名的

「黨內分歧」本身會受到對大選的「選舉預期」的影響，而此「選舉預期」影響了黨內競爭，同時也將影響到大選結果。

然而，「選舉預期」為心理性因素並無法直接估算，究竟哪些因素影響了候選人的選舉的預期？既有研究如Lazarus (2005) 將影響選舉預期的主要焦點放在「現任者優勢」因素，由現任者是否面對黨內挑戰來推估其選舉預期的高低。然而現任者面對黨內挑戰，並不一定反映的是現任者的預期弱勢，本研究認為選區結構的「政黨優勢」，也會影響到選舉預期，使得現任者即使擁有大選的預期優勢，也可能會面對黨內挑戰。過去探討初選與大選兩者關聯性鮮少討論到和現任者優勢高度相關連的政黨優勢，本研究將這兩個因素同時納入。簡言之，本研究認為「選舉預期」乃是由候選人的「現任者優勢」以及選區結構的「政黨優勢」所組成，兩者同時會影響到初選時的黨內分歧以及後續的大選。¹本研究將這些因素之間的因果推論建構如下（請見圖一）。

首先，在政黨提名的黨內競爭階段中，影響「選舉預期」的關鍵因素可推「現任者優勢」。一般來說，現任者所擁有的「預期優勢」會對其他參選人產



圖一 選舉預期、黨內分歧、與大選勝選三者因果推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¹ 審查人指出 Lazarus 的觀點，強調初選（選舉預期）與大選的雙向影響的問題，可能有內生性的問題。本文避免內生性的問題：一是本文雖然借用 Lazarus 的「選舉預期」此一概念，但提出修正。本研究不同於 Lazarus，他將選舉預期偏重於現任者因素，而表現在黨內分歧上（就其推論，黨內分歧 = 現任者弱勢預期 → 不利於大選），此種推論可能有著內生性問題。本文則是指出選舉預期本身並無法直接推算（上述的等式不一定成立），黨內分歧並不只是受現任者優勢與否影響，還受到政黨優勢的影響。兩者對選舉預期的影響不一，甚至方向相反，而和黨內分歧也會產生複雜的連動關係，共同影響大選，應該在同一組模型中加以控制。二是本文在下面的假設中，將兩個因素（現任者與政黨優勢）視為競爭性變數，是兩組平行的概念假設，其對初選有其獨立影響（假設 1A、假設 2A），對於大選也有獨立性影響（假設 1B、假設 2B），選舉預期可以理解為這兩組因果關係之所以發生背後的論據 (rationale)，也就是，現任者或是政黨優勢之所以會影響初選分歧，是因為不同的選舉預期，但而非兩者等同於選舉預期，因此並無內生性問題。

生嚇阻效果，減少黨內分歧；相對地，現任者若是聲望不佳，也有可能產生所謂的「預期弱勢」(perceived vulnerability) (Lazarus, 2005)，可能會使得參選者眾，產生黨內分歧。傳統所謂現任者優勢，主要指的是在單一選區多數決制度之下，由於贏者全拿，以及選區經營等資源有利於選區服務，現任者具有連任優勢。Cox & Katz (1996) 則認為現任者優勢，主要因為嚇阻效果所致 (scare-off effect)。現任者優勢可以分成「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前者是指傳統上的現任者資源，不論是財務上或是選民服務上的優勢，皆直接影響選舉結果，有利於現任者勝選連任。後者則是指現任者有嚇阻效果，有意參選的黨內人士通常不願意挑戰具有勝選經驗的現任者，因為需要付出相對較高的機會成本，且勝選機會不高。有實力的候選人會策略性選擇有利戰場，選擇到沒有現任者的開放選區參選，避免不必要的耗損 (Ban, Llaudet, & Snyder, 2016; Stone, Maisel, & Maestas, 2004)。結果使得現任者在黨內鮮少面對激烈的初選，或是所面對的初選對手通常較無競爭力。

不過，並非所有的現任者，都具有預期優勢的嚇阻效果。不同選舉、不同選區乃至於不同政黨，現任者狀況各不相同。現任者可能基於各種原因，年長或是問政表現不佳，抑或是支持度下滑，而成為弱勢現任者，使得黨內提名過程黨內競爭激烈，並連帶影響到大選的表現。從參選者角度，選區有現任者優勢將使得其他參選人的選舉預期機會以及參選意願下降，黨內競爭有限；反之，當現任者表現不佳，則其他參選人預期有機會且參選意願提高，黨內競爭提名會更加激烈。換言之，參選者往往會對現任者優勢的強弱，做出最貼近當次選舉的判斷，當其他參選者裹足不前時，意味著現任者優勢具有嚇阻效果，而當可能參選者出來挑戰現任者時，則可能代表現任者並未具有嚇阻性的優勢。簡言之，現任者優勢可能不利於黨內競爭，但有利於大選勝選。反之，現任者弱勢則是鼓勵黨內競爭，但經歷黨內競爭的現任者，大選將相對處於不利。現任者優勢對於初選和大選各有不同的影響方式，假設如下：

假設1A：現任者預期優勢的嚇阻效果：在黨內提名階段，現任者因為選舉預期優勢，在黨內面對挑戰者競爭較為有限；而在非現任者的開放選區，黨內競爭相對較為激烈。

假設1B：在大選階段，若現任者在黨內提名時，並未遭遇挑戰，顯示其有較高的選舉預期，有利於大選的勝利；反之，若現任者在黨內初選遭遇挑戰，則意味著現任者的選舉優勢已經下滑，越不利於大選。相對地，對於挑戰者而言，黨內競爭越激烈越有利於大選勝選。

對現任者而言，提名階段的黨內競爭可能是現任者聲勢下滑的一個警訊，不利於大選，這是部分修正論學者特別關注的焦點。但是本研究認為，當現任者在提名時面對黨內挑戰，除了反應出現任者劣勢之外，另外一個可能原因是因為現任者所處的選區結構也有重要的影響。現任者面對黨內挑戰，往往不只是因為其預期弱勢，也有可能經常身處於政黨優勢選區，因此吸引了眾多的挑戰者。就選區因素而言，政黨若是在特定選區的選舉中經常勝選，將影響該黨有意參選者對該區選舉預期的評估。在候選人評估是否投入初選時，當該選區是所屬政黨的優勢選區時，也就是類似政黨地盤或是票倉的概念，不論政黨所提出的候選人為誰（所謂的西瓜說），該選區選民仍較為偏好或支持特定政黨，只要一旦獲得黨的提名背書的候選人都有較高的機會當選，因此黨內參選的情況相對較為踴躍也會提高黨內競爭。簡言之，政黨優勢選區可能有刺激黨內競爭的「磁吸效應」。而此種初選階段因為政黨的選區優勢所產生的黨內競爭，對於大選可能有著正面的效益。簡言之，本研究假設：

假設2A：政黨選區優勢的磁吸效應：黨內提名階段，在政黨優勢選區，潛在候選人評估該選區有選舉預期優勢，可能使得政黨提名時吸引較多黨內競爭。而在政黨的非優勢選區，則因為選舉預期弱勢，而使得黨內競爭有限。

假設2B：在大選階段，優勢選區對於候選人在大選中具有正向的選舉預期效果，因此現任者即使在政黨提名階段遇到黨內競爭的分歧，但若身處於政黨優勢選區，在大選仍然相對有利。

上述兩組假設彼此之間可能存在競合關係，選舉預期影響大選，然而選舉預期本身是受到現任者優勢與政黨優勢兩者的影響。這兩個因素對於政黨提名和大選有著不同的影響方向（現任者優勢的嚇阻 vs. 政黨優勢的磁吸），若將這兩個因素連結來看，如表一所呈顯的四種選舉預期的選區分布：在B、C這兩類型中，兩大選舉預期因素一強一弱，(B) 弱現任者優勢與強選區政黨優勢下，無嚇阻且有磁吸效應，黨內分歧可能增強；而 (C) 強現任者優勢與弱選區政黨優勢下，有嚇阻無磁吸效應，黨內分歧可能減弱，這兩類較容易推論黨內分歧，但這兩類型選區實際上並非多數。在現實中，A、D這兩種類型相當常見，現任者優勢與選區政黨優勢兩者皆強 (A) 或兩者皆弱 (D) 的情況下，兩者的作用方向相反，一是現任者優勢嚇阻減少競爭，另一是選區優勢的磁吸增加競爭，兩者皆強時可能有互相抵銷或競爭作用，兩者皆弱同樣也無法對黨內分歧產生具體的影響，對於黨內競爭的影響，則端視何者有較大影響，也可能對不同政黨有

表一 現任者優勢與選區政黨優勢類別

選區政黨優勢	現任者優勢	
	強	弱
強	A型選區	B型選區
弱	C型選區	D型選區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不同影響。因此在分析上，這兩個選舉預期因素存在競爭的關係，在資料分析時需同時納入模型加以考量。²簡言之，「選舉預期」，可以進一步分候選人與選區等面向來觀察，不同面向對於選舉優勢的評估，可能產生不同的黨內競爭以及大選結果。

肆、資料分析

依據上述假設，以下將針對國內兩大黨國民黨與民進黨在2012年與2016年立委選舉的情況，分析其政黨提名的黨內競爭以及大選的黨際競爭。選擇這兩次立委選舉，主要是單一選區多數決新選制下，經歷過三次立委選舉，但是改制後2008年為新選制下首次立委選舉，因為席次減半以及新選制的變更同時發生，黨內與大選的競爭（角逐減少一半的席次）受到相對複雜較多因素的影響，兩黨也都在調適新選制實驗新的提名方式過程，黨內競爭非常不穩定，甚難直接歸因提名的黨內競爭究竟是受到選制、席次變化，或是個別選區與候選人的影響。2012與2016兩屆立委選舉，在選制改革與席次變化已成定局，兩黨在提名辦法上趨於相似，但仍有不少細部差異。本研究集中蒐集兩大黨在2012與2016兩次選舉之個別提名辦法，同時參酌假設蒐集相關資料，建立個別選區與候選人資料庫，以利本文分析在兩次立委選舉中，國、民兩黨提名階段的黨內分歧與大選競爭的關係。

以下資料分析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先討論國、民兩大黨的立委提名方式，以觀察在實務上，「黨內分歧」如何影響政黨提名策略。第二部分則透過檢視現任者優勢的「嚇阻效果」，以及選區政黨優勢的「磁吸效果」，試圖

² 感謝審查人建議此二因素分析表格，在黨內提名階段，對國民黨而言，最多的選區類別為D類（兩者皆強），其次為A類（兩者皆弱）；對民進黨則是最多為D類（兩者皆弱），其他三類選區次數皆相對較少。兩大黨最少的類別都是B類（有政黨優勢 + 無現任者）。兩因素連動在模型中經常用交互變項處理，本研究也曾處理過，但因類別分配非均值與細格數不足問題，實際上兩因素的競爭關係多過於組合關係，為有效區辨兩者的影響，後續模型處理將區分樣本進行控制，來區辨兩者的競爭性影響。

解釋影響黨內分歧的因素；第三部分則將初選「黨內分歧」與「選舉預期」等因素同時納入分析，據以解釋立委大選的勝選。

一、兩大黨的政黨提名的關鍵考量：黨內分歧

自臺灣國會全面改選以來，兩大政黨的立委選舉提名方式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變化。整體而言，兩大黨立委選舉的提名方式包括黨中央提名（特別委員會）、政黨協調、幹部評鑑、黨員初選、民調、徵召等不同提名方式的組合（王業立，2016）。臺灣主要兩大政黨的提名方式，即使過去在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舊選制下，也經過多次的變革，呈現出非常異質的經驗。在舊選制下，國民黨立委選舉最早傾向由黨中央主導協調的集權方式為之，在2000年敗選後則逐漸朝向更為廣納、更分權式、減少地方派系並減少介入調解的趨勢。同樣在舊選制下，民進黨的提名辦法相對分權，不僅採行初選的歷史較長，亦具有不同的提名過程（幹部評鑑、黨員投票，以及後來普及化的民調），主要也是著眼於透過此些民主方式來化解黨內派系的歧異。比較兩黨提名策略，民進黨提名方式雖有細部調整，但有較長期的民主化提名機制，國民黨則經歷不少提名變革。整體來說，臺灣主要政黨提名方式沒有清楚一致的方向 (Fell, 2006; Wu & Fell, 2001)。

2005年臺灣修憲選制變遷，新選制下的區域立委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多數決制之後，各選區均降至僅有一名應選席次，政黨提名變得非常關鍵。Yu, Yu, & Shoji (2014) 指出從SNTV變成並立式混合制度使得政黨更加仰賴開放的方式，民調因為被視為最能有效解決黨內競爭衝突，成為臺灣政黨決定候選人的主要提名方式。然而，實務上，在新選制之下的個別選區競爭樣態非常不一致，Fell (2013: 164-165) 指出SMD制度下選舉競爭更加激烈與不平衡，在安全選區吸引許多候選人競選，而在沒有希望的選區中卻難以找到候選人。個別選區的候選人條件與選區結構差異，會產生不同的黨內競爭以及不同的大選形勢，也會使得政黨提名時，需要作出不同的提名評估與策略選擇規劃。

本研究探討2012與2016年兩屆立委選舉的兩大黨提名過程，相較之下，民進黨提名方式較為制度化與明確。民進黨提名方式，主要是將選區分為「艱困選區」與「非艱困選區」，自第八屆立委選舉開始（民主進步黨，2011，2015），「艱困選區」定義為前一次立委選舉得票率低於42.5%，既不開放登記也無黨內初選，由黨中央（選舉對策委員會規劃，中執會通過）直接徵召提名參選。若不提名則可能考慮與其他友黨合作、禮讓，保持和其他在野黨、理念相同者合作的空間（俞振華，2018：46-49）。高於42.5%的選區則為開放登

記的「非艱困選區」，若無人登記或因為其他原因則採徵召；如果是同額競選則直接提名，比較特別的是選區內若有補選立委便仍然以民調為主。兩人以上的競爭選區則以「協調」為優先，協調不成則採取全「民意調查」（王業立，2016：173）。

相對之下，國民黨提名方法較為複雜。首先，其將選區區分為「無人登記」與「有人登記」選區，「無人登記選區」多數為艱困選區，同樣黨中央採取徵召為主，或是與友黨協調或禮讓其他無黨籍候選人。「有人登記選區」則分為同額競選和兩人以上競選選區。同額競選選區若有現任者則被列為選情單純選區，通過黨內程序／幹部評鑑後直接提名（俞振華，2018：46-49）；若為非現任者，則須通過30%的民調門檻才提名，若未通過則採取徵召（王寓中，2011a，2011b）。其次，有兩人以上競選的選區，原則上協調或辦理初選。若選區內有現任者，則以現任者優先提名為前提進行協調，³協調不成再由黨中央辦理初選，依照初選結果提名。初選原則上採取「民調占7成，黨員投票占3成」，如果選區登記參選者都同意或多數同意，則可以採取全民調的方式，實際上，各選區都在協調後採取全民調方式。第八屆與第九屆在初選的規範上有細部差異，如第九屆針對現任者有優先黨內民調決定提名的設計，此外大致採取相似程序。⁴

歸納兩大政黨不同的提名方式，大選選舉預期以及內部競爭態勢，是影響政黨提名策略的主要因素。政黨提名策略基本上是滾動式調整，往往在一開始時由黨中央公告基本規則，例如民進黨將選區分為「艱困」與「非艱困」選

³ 協調的類型很多，有的是黨中央勸退挑戰者，如2016年立委選舉臺中市第五選區則是經過黨內協調，勸退前副議長陳天汶，由現任立委盧秀燕出線（陳世宗，2015）。部分選區若友黨參選人民調較高，比國民黨參選人有更高勝選希望，國民黨保留與友黨協商的可能性。例如，2012年協調臺中市第二選區禮讓無黨團結聯盟的顏清標（管婺媛，2011）。2016年則是協調「兩立委之爭」的臺中第二選區，國民黨立委選舉策略委員會決議徵召現任立委顏寬恒，並協調現任不分區立委紀國棟轉戰其他選區（楊毅，2015a）。

⁴ 第八屆初選按照提名辦法規定（王正寧，2011），初選方式為「民調占7成，黨員投票占3成」，但如果選區內所有登記者同意或過半數同意情況下，可以「全民調」方式進行，無須辦理黨員投票（施曉光，2015）。第九屆民調方式修正為現任立委以外還有其他人登記，中央黨部辦民調，只要現任立委贏其他參選人超過五個百分點，就提名（楊毅，2015b）；現任立委如果沒有贏超過五個百分點就委託民調公司辦初選（俞振華，2018），初選方式與第八屆相同為「民調占7成，黨員投票占3成」，但如果選區內所有登記者同意或過半數同意情況下，可以「全民調」方式進行，無須辦理黨員投票（王業立，2016：152-154）。實際上，第八屆與第九屆兩屆需辦理民調的選區，最後經由地方黨部協調候選人，皆採100%全民調方式進行。

區，國民黨區分為「無人登記」以及「有人登記」選區；兩黨都有現任者優先提名的潛規則，但是若現任者聲勢不佳，可能面對黨內競爭，則可能納入民調或協調。選區結構的艱困與否以及候選人的現任者優勢，都會影響政黨的「選舉預期」、「黨內分歧」，以及相對應的政黨在個別選區的提名策略。

兩大政黨提名方式依照「黨內分歧」的有無，可以區分為兩大類，一是由黨中央直接提名或是徵召方式，另一種則是開放參選再進行協調與民調。第一大類當政黨選擇「直接提名」或是「徵召」方式，通常都是「無黨內分歧」情況。在提名階段無黨內分歧，可能因為現任者優勢（安全選區）嚇阻了可能參選者，因為政黨通常優先提名現任者。然而，也可能是因為政黨勝選機會極小的選區（民進黨將之稱為艱困選區），較少人會有動機去登記參選，政黨必須主動徵召候選人。不論是安全選區或是艱困選區，同樣缺乏黨內競爭，多由政黨直接提名或是由黨徵召，都是黨中央決定提名人選。第二大類當政黨選擇「協調」或「民調」方式決定提名，通常都是「有黨內分歧」的情況。就候選人因素而論，雖然多數現任者有預期優勢，但是當現任者聲勢下滑時也可能出現預期劣勢，當黨內出現挑戰者參選，政黨便會改採其他提名方式，如協調或民調來化解黨內競爭。就選區結構而言，若該選區為政黨地盤鐵票區，也會鼓勵黨內候選人的參選，可能產生黨內高度競爭，政黨必須採取較為分權民主的方式來決定提名。簡言之，政黨在不同選區的提名方式，乃是因應黨內因應不同局勢的策略性選擇，關鍵在於黨內競爭的高低，以及其對後續大選的預期與影響。

就過去2012與2016年兩次立委選舉，從表二、三檢視不同候選人（現任者與否）以及選區結構（政黨優勢與非優勢選區）條件下，政黨提名方式是否符合上述理論預期。⁵首先，表二就候選人因素來看，在現任者參選選區，可以發現不論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現任者參選選區，皆以「直接提名」做為主要提名方式，除了2016年國民黨的現任者直接提名比例有下降至5成以下外，在兩屆立委選舉中，兩黨現任者參選選區有7～8成由政黨直接提名，後續大致依序為民調、協調或徵召；兩黨在非現任者被提名選區，皆以「徵召」做為主要提名方式，民調次之。不過，從政黨提名策略來看，現任者雖然有不少是透過直接提

⁵ 分析單位為立委一選區，單一選區共 73 席，但兩黨的選區個數中排除禮讓第三黨選區的選區數以及上屆現任者因故去職補選的選區數。

表二 國、民兩黨有無現任者被提名選區的黨內提名方式

提名方式	國民黨				民進黨			
	現任者		非現任者		現任者		非現任者	
	<i>n</i>	%	<i>n</i>	%	<i>n</i>	%	<i>n</i>	%
2012年								
有分歧								
民調	4	10.00	8	25.81	2	25.00	10	16.39
協調	3	7.50	1	3.23	0	—	7	11.48
無分歧								
徵召	1	2.50	15	48.39	0	—	38	62.30
直接提名	32	80.00	7	22.58	6	75.00	6	9.84
總選區	40	100.00	31	100.00	8	100.00	61	100.00
2016年								
有分歧								
民調	14	43.75	7	17.50	4	18.18	14	36.84
協調	2	6.25	0	—	1	4.55	3	7.89
無分歧								
徵召	1	3.13	29	72.50	1	4.55	17	44.74
直接提名	15	46.88	4	10.00	16	72.73	4	10.53
總選區	32	100.00	40	100.00	22	100.00	38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政黨提名資料庫。

名，但仍有不少須透過民調或是協調，這也顯示即使都是現任者，政黨以及挑戰者對於現任者的狀況仍有不同的評估。

其次，就選區結構而論，表三比較政黨優勢選區與非優勢選區的提名模式。本研究對「政黨優勢選區」的定義為：前兩屆總統大選中，於該立委選區之該黨之總統候選人得票率平均數，並以得票率55%為界，大於等於55%則該選區具有政黨優勢。過去研究對於優勢選區有不同界定方式，但多以總統大選得票率而不以立委得票率來計算，主要試圖區隔候選人個人優勢與政黨優勢，而以上次總統大選該黨在該選區得票率高於55%為經常使用的安全選區判準 (Carson et al., 2012: 134; Mayhew, 1974: 304)，本文則在政黨優勢選區的變數操作上加以修正，主要係考量單一次選舉容易受到整體氣勢風向與個別候選人因素的影響，而無法反應政黨在特定選區長期較為穩定的政黨優勢。以2012年立委選舉的政黨優勢選區判定為例，因為2008年民進黨總統選舉情勢相當不利，若單以2008年總統大選該黨得票超過55%來推算，可能低估了其優勢選區個數（若採單屆推定，民進黨於2008年僅有三個優勢選區），若再往回推至2004

表三 國、民兩黨有無政黨優勢選區的黨內提名方式

提名方式	國民黨				民進黨			
	政黨優勢		非政黨優勢		政黨優勢		非政黨優勢	
	<i>n</i>	%	<i>n</i>	%	<i>n</i>	%	<i>n</i>	%
2012年								
有分歧								
民調	8	25.81	4	10.00	2	13.33	10	18.52
協調	2	6.45	2	5.00	3	20.00	4	7.41
無分歧								
徵召	1	3.23	15	37.50	3	20.00	35	64.81
直接提名	20	64.52	19	47.50	7	46.67	5	9.26
總選區	31	100.00	40	100.00	15	100.00	54	100.00
2016年								
有分歧								
民調	21	47.73	0	—	5	45.45	13	26.53
協調	2	4.55	0	—	0	—	4	8.16
無分歧								
徵召	9	20.45	21	75.00	0	—	18	36.73
直接提名	12	27.27	7	25.00	6	54.55	14	28.57
總選區	44	100.00	28	100.00	11	100.00	49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政黨提名資料庫。

年，民進黨總統大選情勢相對較佳，兩屆平均亦較能反映政黨均值實力。同樣地，對國民黨而言，以單屆總統大選得票率也可能高估其優勢選區個數。在此操作定義下，本研究區分優勢選區與非優勢選區，並比較兩者的提名方式，可見兩大陣營於政黨優勢選區的提名方式相當多元而分散，政黨直接提名和民調都占了較高比例；反之，在非優勢選區則都傾向以徵召為主要的提名方式，也顯示出在非優勢選區的黨內競爭相對較為有限。

彙整兩屆兩黨各選區提名方式，可以看到看似繁複的政黨提名策略，存在一定的規律性，「有黨內分歧」和「無黨內分歧」將政黨的提名方式做了有效的區隔，無政黨分歧時政黨可以採取相對集權的提名方式（直接提名或徵召），有政黨分歧時政黨必須以相對民主的提名方式回應（協調或民調）。與其說政黨的提名策略具有主動性，實際上經常是反應了選舉預期與黨內競爭態勢所採取的回應性策略。如果「選舉預期」與「黨內分歧」是影響提名策略的關鍵，兩者之間又有何種關係？又是哪些因素決定了黨內分歧的有無？下一個部分的資料分析將試圖回答這兩個問題。

二、影響黨內分歧的因素

從上一階段的敘述統計可見，政黨提名方式可謂在極大化「選舉預期」以及解決「黨內分歧」的考量下，為因應不同選舉態勢而為之策略選擇，兩者之間密切相關，「選舉預期」影響著「黨內分歧」。然而「選舉預期」如何推估？又是如何影響初選的「黨內分歧」？在前述理論建構部分，本文已指出兩大政黨在提名時對選舉預期的推估，主要是受到現任者優勢與選區政黨優勢這兩個因素影響。底下將首先討論黨內分歧的定義與操作，進而逐一檢視選舉預期相關因素對黨內分歧的影響。

關於黨內分歧此一概念，Johnson et al. (2010)、Lazarus (2005) 等學者將「初選的分歧程度」(divisiveness of primaries) 做為「選舉預期」的主要指標，初選分化程度是由同黨或是他黨參與的競爭者人數來計算（參看Johnson et al. [2010: 938] 討論）。當初選分化程度越高，也就代表潛在參選者對於選舉預期愈強，或者是現任者優勢越弱，選區越為開放。也因此初選分歧程度往往成為參選者選舉預期以及現任者優勢與劣勢的指標。美國研究初選分歧度主要是以個別選區參選人數多寡來計算，和美國多數選區皆採取初選有很大的關係。

不過，在臺灣的區域選舉中，「分歧程度」不若「分歧與否」能夠有效區分黨內的競爭情況，主要原因有三：（一）由於政黨提名策略的介入，將提名方式區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由黨中央決定的直接提名與徵召，第二類則是開放參選再進行協調與民調，前者屬於無競爭的選區，後者屬於有競爭的選區，因此黨內提名時已經將黨內分歧的主要分界點，設定為黨內競爭的「有無」；（二）在有競爭的選區中，人數的多寡並不完全等於競爭的強弱，有的選區只有兩位競爭者，但競爭相當激烈的割喉戰；有的選區的競爭者人數多，但是呈現的是人人有機會個個沒把握的實力分散狀況；（三）考量現實，臺灣立委初選的選區競爭人數分布，主要集中在沒有競爭（同額參選）與2人競爭的情況，國民黨各選區平均競爭人數為1.48；民進黨各選區平均競爭人數為1.56，若以競爭人數來比較各選區的競爭分歧，恐無法反映其分布相對集中（於同額1或2人競爭）的問題。綜上考量，本研究遂以黨內分歧的有無，作為黨內分歧的主要指標。

在影響黨內分歧的因素中，表四首先檢視候選人「現任者優勢」對於本黨與對手政黨的黨內分歧影響，將兩黨區域立委選區分為該黨「現任者參選」（安全選區）選區以及該黨「現任者未參與初選」（開放選區）選區，並比較在初選階段該黨與對手政黨有黨內分歧的選區比例。由於選區個數差異大，單

表四 有無現任者參與初選選區之黨內分歧選區數

方向	國民黨				民進黨			
	參與		未參與		參與		未參與	
	個數	黨內分歧 (百分比)	個數	黨內分歧 (百分比)	個數	黨內分歧 (百分比)	個數	黨內分歧 (百分比)
2012年	45		28		9		64	
本黨		11 (24.44)		4 (14.29) ^c		3 (33.33)		17 (26.56) ^h
對方		10 (22.22) ^a		10 (35.71) ^d		0 (0.00)		15 (23.44) ⁱ
2016年	34		29		25		51	
本黨		17 (50.00)		5 (12.82) ^e		5 (22.73)		17 (33.33) ^j
對方		9 (26.47) ^b		13 (33.33) ^f		1 (4.55) ^g		21 (41.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政黨提名資料庫。

註：^a3選區未提名。

^b11選區未提名。

^c2選區未提名。

^d1選區未提名。

^e1選區未提名。

^f2選區未提名。

^g1選區未提名。

^h4選區未提名。

ⁱ2選區未提名。

^j13選區未提名。

純比較選區個數可能失準，因此以下詮釋係以「黨內分歧選區數占該分類（現任者參與初選，或現任者未參與初選）之選區個數百分比」來進行觀察比較。整體而言，在2012年，國民黨現任者參與初選的選區中，現任者面對黨內挑戰的比例有24.44%，在2016年則有一半（50%）；2012年民進黨現任者參與初選的選區，有33.33%遭遇到黨內挑戰，2016年則有22.73%選區遭遇到挑戰。兩黨皆是在政黨大選聲勢較差的年度（國民黨的2016年與民進黨的2012年），現任者對於黨內競爭的嚇阻能力較低。這似乎顯示，現任者優勢並非如預期地高，其嚇阻效果也相對有限，雖然國民兩黨皆有超過一半的現任者無需面對黨內挑戰，但是也有為數不少的現任者選區遭遇挑戰，國民黨現任者遇到黨內挑戰的比例又比民進黨高。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現任者參與初選選區皆具有積極嚇阻對方政黨黨內競爭的效果，在本黨現任者參選的選區，對方政黨的黨內分歧度相對較低，特別是在民進黨現任者參選的選區，其對手國民黨在同選區初選黨內分歧的比例極低。相較於國民黨，民進黨更積極的挑戰國民黨現任者，反之，國民黨則較不願挑戰民進黨現任者。

若是比較現任者參與初選選區相對於無現任參選選區的黨內分歧，現任者相對於非現任者，並沒有嚇阻黨內競爭的效果（該效果幾乎僅能在2016年的民進黨觀察到），該黨無現任者參選選區中政黨分歧比例相對都偏低。但是在無現任者參選的選區可能同時也是政黨艱困選區，因此願意投入的挑戰者少，黨內分歧也低。因此，沒有現任者參選的選區缺少黨內競爭的現象，可能是選區缺乏政黨優勢的結果，必須將候選人的現任者優勢與選區政黨優勢同時加以考量。

接著，表五比較「政黨優勢」對於黨內分歧的影響。當進一步比較兩黨於「政黨優勢」選區與「非政黨優勢」選區之黨內分歧選區比例，可以發現，在政黨優勢選區的黨內分歧選區比例皆高於非政黨優勢選區，符合理論預期，優勢選區可能吸引較多黨內競爭。尤其在2016年時，在29個國民黨的非政黨優勢選區當中，全數無政黨分歧，此或許可解釋為：參與國民黨之黨內競爭者，是相當重視該黨在選區是否具有優勢；同時也可以看到，無論是第八屆或第九屆，當該選區為民進黨之政黨優勢選區時，國民黨皆未有黨內分歧的情形，此或可解釋為：民進黨政黨優勢亦有高度嚇阻對手政黨競爭之效。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政黨優勢選區往往正是對手的艱困選區，本黨優勢選區往往會使得對手政黨缺乏競爭，這個效應在兩黨皆有鮮明的影響。在國民

表五 有無政黨優勢選區之黨內分歧選區數

方向	國民黨		民進黨	
	政黨優勢選區	非政黨優勢選區	政黨優勢選區	非政黨優勢選區
	個數 黨內分歧 (百分比)	個數 黨內分歧 (百分比)	個數 黨內分歧 (百分比)	個數 黨內分歧 (百分比)
2012年	31	42	15	58
本黨	9 (29.03)	6 (14.29) ^c	6 (40.00)	14 (24.14) ^e
對方	2 (6.45) ^a	18 (42.86)	0 (0.00)	15 (25.86) ^f
2016年	44	29	11	62
本黨	22 (50.00)	0 (0.00) ^d	5 (45.45)	17 (27.42) ^g
對方	9 (20.45) ^b	13 (44.83)	0 (0.00)	22 (35.48) ^h

資料來源：本研究政黨提名資料庫。

註：^a4選區未提名。

^b13選區未提名。

^c2選區未提名。

^d1選區未提名。

^e4選區未提名。

^f2選區未提名。

^g13選區未提名。

^h1選區未提名。

黨與民進黨的優勢選區，也就是對手的艱困選區，對手出現黨內競爭的比例皆極低。2012年國民黨優勢選區中（31個），民進黨有四選區未提名候選人，有提名選區中也僅有兩選區出現黨內競爭，2016年國民黨政黨優勢選區中（44個），民進黨有13選區未提名，有提名的選區中也僅有少數（9個）出現黨內競爭。而在民進黨優勢選區中，兩次選舉中國民黨提名皆沒有黨內競爭。

整體來看，如果將現任者參選對黨內競爭的嚇阻效果，與選區政黨優勢對黨內競爭的磁吸效果相比，似乎選區的政黨優勢相對於候選人個人優勢，在解釋政黨內部初選分歧上，更為重要。不過，現任者優勢與政黨優勢兩個因素，並非完全獨立的，現任者優勢的選區，也可能是政黨優勢的選區。此外，其他因素如屆次的政黨聲勢等，也都可能影響黨內提名的競爭態勢。現任者與政黨優勢因素對於黨內競爭的個別影響，必須透過模型加以分別控制，才得以有效區隔。

上述分別探討選舉預期因素個別對於黨內分歧的影響，主要解釋變數為現任者參選以及政黨優勢選區，不過現任者優勢選區與政黨優勢選區兩者可能存在高度重疊但不相等的關係。理論上，兩者對黨內競爭的預期影響方向是相反的：現任者的嚇阻作用會減少黨內分歧，而政黨優勢的磁吸作用會增加黨內分歧。在本研究變項操作上，現任者參選選區意指「上屆立委當選者繼續尋求連任」的選區；而政黨優勢選區，則是以前兩屆總統選舉該黨總統候選人，在該選區的得票率相加取平均數是否高於臨界值（55%）來界定。很多政黨優勢選區可能有現任立委參選，但某黨優勢選區的現任者也很可能因個人因素並未參加黨內初選，或是在黨內初選中敗下陣來，因此這兩變數並非相等，前者看的是候選人個人條件的影響，後者看的是選區的政黨實力。

為了釐清並區辨兩者的關係，本文進一步將之用模型來檢視這些因素對於黨內分歧的影響。⁶以「政黨分歧」與否的二分虛擬變數為依變數，底下模型將兩屆立委選舉資料合併，並採用二元勝算對數洛基 (logit) 模型分析，來分別探

⁶ 審查人建議觀察兩黨策略性互動，「對手現任者／政黨優勢」對本身政黨候選人參選的影響。從兩大黨作為分群標準的模型設定無法操作，因為涉及到自變項兩黨變數之間的共線問題——本身政黨現任者在對手政黨便是挑戰者，無法設定為兩個變數。而需從兩大黨之現任者與挑戰者四分群當中，才得以觀察到。本研究也嘗試做過這樣的分群方式與模型設定，但是在民進黨中有樣本數不足、在國民黨中有對特定自變數依變數不具變異等問題。舉例而言，從國民黨的角度切入，對手具政黨優勢的樣本數量共計 26 筆，然在這 26 筆樣本當中，國民黨黨內初選全數未有分歧。對此變數而言，依變數不具變異致使標準差過大，不適合以模型解釋。因此要觀察對手現任者與政黨優勢對我方初選分歧的影響，本研究敘述統計為之（見表二、三以及正文相關討論）。

討論國民兩黨黨內初選分歧的影響因素。⁷參照理論假設，現任者因為預期優勢，具有減少黨內分歧的嚇阻作用，而優勢選區則具磁吸作用，將提高黨內分歧，因此主要自變數為選區是否有現任者，以及政黨是否具有選區結構性優勢。除了現任者是否參與初選之外，現任者上次得票率以及現任者在位屆數，也和現任者優勢高度相關。一般預期，在位者上次選舉的得票率越高以及在位屆次越久，現任者優勢越高，也同樣放入模型加以檢測。

另外，基於兩屆選舉的政黨聲勢不同，且同時進行的總統大選，也可能對立委選舉具有衣尾效應，這些大環境因素，使得大選有不同的「選舉預期」，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屆次變數以控制兩屆差異。合理預期為，當政黨在該次大選聲勢較佳，包括總統選舉中該黨聲勢大好，也就是「選舉預期」具有整體性優勢時，該黨的黨內初選參選者普遍會較為踴躍，甚至可能出現黨內參選爆炸的現象。政黨與候選人通常會評估政黨在該次大選的整體聲勢，再決定是否參選。如何評估大選的政黨整體聲勢？由於兩次大選之間已經間隔四年，上次大選的聲勢和該次大選的情況，已經有所不同，無法由過去選舉來評估，因此，在操作上多採取事後評估，也就是選後成為多數黨的政黨。在該次選舉中，不論是民調或是媒體的討論中，都會出現對該黨較為樂觀的選情評估，而樂觀的選情評估和選後的佳績多數是一致的，因此選後成為多數黨的政黨，可以反推其在選舉過程中的聲勢較佳。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大選聲勢較佳的政黨（該屆次的多數黨），黨內參選者相對踴躍。

從表六模型分析結果看來，在控制了相關解釋黨內分歧的其他因素之後，在現任者優勢的部分，民進黨現任者參與初選和黨內分歧具有顯著負向關係，當現任者參選時，黨內分歧的機率相對於不分歧的機率，為現任者未參選的0.31倍。且現任者上次的得票率越高越不會出現黨內分裂，顯示民進黨的現任者確實有嚇阻黨內競爭的效果。而在政黨優勢部分，兩大黨的政黨優勢選區皆和黨內初選分歧有著正向關係，也就是在國民兩黨的政黨優勢選區會產生磁吸效果並刺激黨內競爭，大致上符合假設。

⁷ 分析單位為立委一選區，因為分開政黨，加上單一選區，因此政黨候選人個人等同於個別選區。兩屆總和模型中，國民黨樣本數僅有102筆，因模型中納入變數有樣本流失問題，如現任者上次得票率變數有遺漏值（可能因現任者未繼續參選，或是現任者非為兩大黨，以及補選勝選未列入等因素），以及國民黨未提名選區等。民進黨兩屆總和樣本數僅有90筆，同樣也是因為模型中納入變數遺漏值的結果，如現任者上次得票率變數，以及未提名選區數排除後，樣本數減少。有補選選區視為遺漏值，因為恐有補選前後兩位現任者認定問題。

表六 解釋黨內初選分歧與否的二元變數洛基 (logit) 模型

依變數：黨內初選分歧 logit model	國民黨			民進黨		
	Estimate	OR	SE	Estimate	OR	SE
本黨現任者參與初選	2.64	13.97	1.13 [*]	-1.18	0.31	0.68 [†]
政黨優勢選區	1.25	3.49	0.72 [†]	1.17	3.22	0.70 [†]
現任者在位屆數	-0.25	0.78	0.21	0.11	1.11	0.22
現任者上次得票率	0.02	1.02	0.04	-0.13	0.88	0.06 [*]
第九屆（對照組：第八屆）	1.33	3.77	0.59 [*]	0.68	1.98	0.54
N		102			90	
Null deviance	108.89 on 101 <i>df</i>			106.35 on 89 <i>df</i>		
Residual deviance	85.10 on 96 <i>df</i>			96.27 on 84 <i>df</i>		
Missing	44			56		
AIC	97.10			108.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政黨提名資料庫。

註：[†] $p < .10$ ，^{*} $p < .05$ 。

兩黨較不相同之處，從模型結果推知，相對於民進黨現任者具嚇阻作用較不易出現黨內分歧，國民黨模型中，現任者較容易面對初選黨內競爭。國民黨現任者對於黨內挑戰者不但沒有嚇阻作用，反而有「鼓勵」（正向）的作用，可能的原因是，這些區域同時是國民黨長期具有優勢選區，也正是民進黨的艱困區，例如花東及外島，民進黨對國民黨不具威脅，贏了國民黨的黨內初選便極可能贏得大選，政黨優勢選區對於吸引黨內競爭有重要的解釋力。

不過，就現任者優勢與政黨優勢因素的相對影響力而言，在國民黨模型中，即使已經控制了選區政黨優勢因素，現任者相對於非現任者仍面對較多的黨內分歧。前述假設推論指出（假設1B），若現任者在黨內初選遭遇挑戰，可能意味著現任者的選舉優勢已經下滑，越不利於大選。表四也同樣顯示，雖然國民黨兩黨不少的現任者不會面對黨內挑戰，但是也有為數不少的現任者選區遭遇挑戰，而國民黨現任者遇到黨內挑戰的比例又比民進黨高，就理論假設以及模型結果，確實再次證實國民黨現任者在嚇阻黨內分歧的能力不若民進黨，也就是現任者預期優勢較弱。

另外，政黨整體聲勢的部分，國民黨模型中，聲勢較差之第九屆和黨內初選分歧有著顯著正向關係，政黨聲勢低時黨內分歧反而較高，當然也可能因為國民黨上一屆大勝，使得該屆參選者眾，同時該屆選舉政黨整體聲勢較低，政黨無法有效調節黨內提名策略所致。

三、提名的黨內競爭對於大選的影響

依照本研究理論假設，「選舉預期」影響黨內競爭，連帶影響了大選。「選舉預期」乃是一個複雜的計算，包含了候選人現任者優勢與選區政黨優勢，一般來說，現任者優勢與選區政黨優勢，應該都是有利於大選競爭的選舉預期，因此比較不同的選舉預期條件對於大選得票率的影響，可以初步檢證選舉預期與實際得票率之間的關係。先就候選人「現任者優勢」條件而言，表七比較現任者與非現任者在大選的平均得票率，可見現任者得票率通常高於非現任者的得票率，兩黨在兩屆立委選舉中，現任者被提名選區與非現任者被提名的選區的大選得票率相差都超過10%，顯見現任者的預期優勢確實顯現在大選中。再就政黨「選區優勢」來看，表八呈現國民兩黨在兩屆立委選舉中，優勢選區的平均得票率皆高於非優勢選區的平均得票率，兩者的得票亦有10%的差距。

整體而言，除了2016年國民黨的政黨優勢選區得票率較低之外，兩黨在兩屆立委選舉當中，政黨優勢選區的平均得票率皆高於現任者優勢選區的得票率，民進黨此種現象更是明顯。這樣的現象反映出政黨優勢的選舉預期較為接近大選結果，而現任者的優勢則有較多內部差異。也就是現任者被提名的連任

表七 比較現任者與非現任者的大選得票率

年分	國民黨				民進黨			
	現任者 被提名選區		非現任者 被提名選區		現任者 被提名選區		非現任者 被提名選區	
	選區 個數	平均 得票率	選區 個數	平均 得票率	選區 個數	平均 得票率	選區 個數	平均 得票率
2012	40	52.61%	31	43.44%	8	58.05%	61	44.26%
2016	32	45.62%	40	35.51%	22	63.23%	38	49.75%

資料來源：本研究政黨提名資料庫。

表八 比較優勢選區與非優勢選區的大選得票率

年分	國民黨				民進黨			
	政黨優勢選區		非政黨優勢選區		政黨優勢選區		非政黨優勢選區	
	選區 個數	平均 得票率	選區 個數	平均 得票率	選區 個數	平均 得票率	選區 個數	平均 得票率
2012	31	53.29%	40	44.98%	15	56.19%	54	42.99%
2016	44	43.90%	28	33.87%	11	65.39%	49	52.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政黨提名資料庫。

優勢，並非鐵板一塊，現任者有可能有預期優勢，也可能其優勢已經下滑。現任者優勢的高低可以由政黨提名階段，現任者是否受到挑戰的黨內競爭態勢來加以區辨。

上述整體資料顯示，現任者選區得票率高於非現任選區的得票率，政黨優勢選區的得票率高於非政黨優勢選區的得票率，也就是，候選人為現任者與選區政黨具有優勢兩者，皆有相對獲票優勢。但是，現任者並非總是具有選舉預期優勢。當現任者聲勢下滑，通常會直接反映在其黨內嚇阻效果失靈，使得其在黨內提名時，遭遇到黨內對手挑戰，在前述關於黨內分歧的資料顯示不少的個案。而當現任者參與初選面對黨內分裂時，可能正反映出對現任者的預期劣勢，而這樣的預期劣勢，則可能使得現任者在大選中相對不利。不過，現任者遭受黨內挑戰，也可能是因為選區政黨優勢太強所產生磁吸效果，參選者有較高的選舉預期，在此種情況下，即使有黨內分裂，也不一定會不利於大選。究竟對現任者而言，黨內分裂是否代表預期劣勢的嚇阻失靈，而不利於大選？抑或現任者也同時處於政黨優勢選區，若此黨內分歧是否仍會不利於大選？

現任者選區與政黨優勢選區有相關但不相等，現任者優勢、政黨優勢、黨內競爭，以及大選表現彼此之間的因果關係，必須透過模型進一步加以控制釐清。下列模型同樣將國民兩黨分開，並進一步區分現任者與挑戰者參選選區，以四群體（國民黨現任者、國民黨挑戰者、民進黨現任者、民進黨挑戰者）進行迴歸模型分析，來檢視黨內分歧與否，以及政黨優勢對於現任者和挑戰者的不同意義。其中，本黨挑戰者模型，指的是本黨沒有現任者，但主要對手有現任者的選區。四組樣本中排除兩大黨皆沒有現任者的選區，因為選區沒有任何現任者，無法檢測對現任者預期優勢或弱勢的影響。⁸

為檢測選舉預期相關因素對大選的影響，以下模型以立委選舉得票數作為依變數，主要的自變數為初選時是否有黨內分歧以及選區政黨優勢。依照理論

⁸ 政黨提名階段模型與大選模型所排除的開放選區，指的兩大黨沒有現任者參選的選區，兩者分析對象原則上一致。初選的敘述統計中（如表四～六），該黨沒有現任者參選的選區個案，在大選模型中多數已納入該黨挑戰者（對方現任者）模型中。整體來說，扣除註腳 6 說明的變數遺漏值（以及大選排除「參與初選現任者最終未被提名」者），研究對象與個案數都是前後相符的。模型未納入少數的開放選區（兩大黨皆無現任者），主要考量：一是扣緊本文核心論證，本文嘗試釐清「政黨優勢」和「現任優勢」之間的消長作用，在兩黨皆無現任者開放選區無法比較兩這作用，二是模型設定問題，若納入開放選區因此無法操作編算模型中的「現任者在位屆數」、「現任者上次得票率」兩變數，因此也加以排除。

假設，現任者初選是否遭遇黨內挑戰，會反映出現任者預期優勢或劣勢，若現任者面對黨內挑戰，顯示其預期優勢下滑，對於大選得票相對不利。政黨優勢和黨內分歧的效果則是相對的，當政黨在該選區具有優勢時，可預期對於大選得票率有正向的影響。另外，模型中將兩屆合併進行模型分析，但是兩屆選舉的政黨整體聲勢大不相同，2012年大選為國民黨執政尋求連任，整體政黨聲勢對國民黨較為有利；反之，在經歷太陽花運動之後，2016年選舉民進黨的預期聲勢大幅提升。政黨整體聲勢的變動，對於政黨提名候選人的獲票能力預期也會產生影響，因此模型中也加入屆數變數以為控制。

其他可能影響大選得票率的因素，同樣包括了選區的現任者連任屆次，以及現任者上次選舉得票率，此兩變數和現任者優勢指標的差別在於，連任屆次或是上一次選舉的得票率，反映的是現任者過去實力累積或是四年前現任者參選時的支持度，反之，黨內初選分歧反映的則是經過四年後，政黨內部挑戰者對於現任者的任期內表現，以及選舉實力之總結性評估。簡言之，連任屆次以及上次得票率測量到的都是現任者過去的表現，而初選階段是否有黨內分歧則是對現任者更為整體性、更為近期的選舉預期指標。

表九分成四群體，考量同一選區的對立角色（現任者與挑戰者），因此先將國民黨現任者與民進黨挑戰者一併討論，再將民進黨現任者與國民黨挑戰者一起討論。普通最小平方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迴歸模型結果顯示：對於國民黨現任者而言，身處政黨優勢選區，對於其得票率有著顯著正向影響，面對黨內分歧雖有負面影響，但效果並不顯著，第九屆相對於第八屆的大選獲票顯著地下滑。相對地，對於民進黨挑戰者而言，身處政黨優勢選區同樣有拉

表九 影響大選得票的解釋因素

依變數：本次立委 選舉得票率	國民黨現任者		民進黨挑戰者		民進黨現任者		國民黨挑戰者	
OLS model	Estimate	SE	Estimate	SE	Estimate	SE	Estimate	SE
黨內初選分歧	-2.19	1.66	3.03	1.53 [†]	-6.35	2.49*	3.37	4.88
政黨優勢選區	3.70	1.85*	5.98	2.29	1.42	2.67	2.09	2.48
現任者在位屆數	-0.37	0.53	-0.27	0.49*	-1.80	1.39	0.30	1.09
現任者上次得票率	0.15	0.12	-0.65	0.13***	1.30	0.30***	-0.83	0.22***
第九屆（對照組： 第八屆）	-7.10	1.62***	2.74	1.35*	0.52	3.15	0.14	2.09
Adjusted R ²	.28		.57		.56		.54	
樣本數	73		60		30		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政黨提名資料庫。

註：[†] $p < .10$ ，* $p < .05$ ，*** $p < .001$ 。

抬選票的效果，黨內初選分歧有著正向的影響，對手現任者上次的得票率對其得票率有顯著負面影響。如何解釋兩黨的對手政黨影響其得票率因素的差別？其實由初選黨內分歧模型（表六），便可推知兩黨分歧代表不同意義（相反方向）。對國民黨現任者，缺乏個人優勢嚇阻作用，有無初選分歧並不會影響大選結果。因此面對黨內分歧雖不利但對大選無顯著影響，政黨優勢有比較重要的得票影響。相對地，對民進黨挑戰者，黨內分歧初選提升其知名度，對大選獲票有正面影響，政黨優勢選區亦有得票拉抬拉果。

觀察另一組對手的情況，對於民進黨現任者而言，初選黨內分歧對其大選得票率有顯著的負面效果，而現任者上次得票率越高，對於此次大選得票率越有顯著正面加分效果；相對地，對於國民黨挑戰者而言，對手現任者上次大選得票率越高，此次大選得票率越低。同樣地，解釋兩黨的得票率的差別可由初選模型來推論，民進黨現任者具有嚇阻黨內分歧優勢，因此黨內分歧顯示優勢下滑，對其當選相對不利。對國民黨挑戰者而言，該黨現任者並無嚇阻分歧優勢，黨內分歧並不影響其得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為何這兩群體的政黨優勢雖有正向但皆無顯著影響？從前述理論假設推敲，政黨優勢和現任者優勢對於黨內競爭存在競合的關係，民進黨現任者的嚇阻能力夠強，也可能使得政黨優勢無法發揮顯著地拉抬選票效果。在民進黨現任者具有高度優勢的情況之下，政黨優勢選區僅是扮演補充作用的角色；而同樣位處民進黨現任者選區的國民黨挑戰者，面對著具有強烈個人優勢的民進黨現任者，其政黨優勢無法協助其取得太大的作用，也可能是因為對手有較強的影響。

整體來說，對於國民黨現任者而言，選區的政黨優勢以及屆次所反映的政黨整體聲勢，是大選獲票的重要解釋；對於民進黨而言，現任者優勢則具有關鍵影響，當現任者面對黨內分歧，則隱含著其聲勢下滑受到黨內挑戰，恐不利於大選，且若現任者上次得票率越高，越有利於大選的表現。

伍、結論

政黨提名階段的黨內競爭對於大選有何影響，是本研究最關切的核心問題。既有文獻不論是懲罰論或是紅利論，並無一致的研究結論，本研究修正並提出兩個重要的理論貢獻：一則，相對於過去研究多為停留在單向的因果推論，本研究採取Lazarus (2005) 的觀點，強調黨內初選與大選的雙向影響。在黨內提名階段的「黨內分歧」，經常受到對大選的「選舉預期」影響，而此「選舉預期」也會影響大選結果；二則，本研究進一步指出，大選的「選舉預期」是由不同評估所構成，包括了候選人為現任者因素以及選區結構因素，過

去修正論者如Lazarus等雖然強調現任者候選人因素，但較少關注於選區結構因素，本研究同時考量兩者對於初選黨內分歧的影響，並與黨內分歧共同影響了大選的黨際競爭。在候選人因素部分，當選區內現任者有「選舉預期」優勢時，可能在黨內提名時產生「嚇阻效果」，減少黨內競爭分歧；反之，若現任者聲勢下滑出現「選舉預期」劣勢，可能會面對黨內分歧。而在大選階段，無黨內分歧的現任者相對於面對黨內分歧的現任者在大選中相對有利。在選區結構因素部分，當政黨於特定選區具「政黨優勢」時，黨內初選將產生「磁吸效果」，加劇黨內分歧競爭。此黨內分歧乃是因為對政黨預期選舉優勢而來，因此經過激烈黨內競爭被提名的候選人將有較高的機會贏得大選。

本研究整合第八屆與第九屆立委選舉相關資料，分析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大黨在初選黨內競爭，與大選黨際競爭的實際情況。在政黨提名階段，兩黨初選黨內分歧模型檢證，政黨優勢選區對兩黨皆有刺激黨內競爭的磁吸結果，而現任者嚇阻黨內競爭的效果，則在民進黨的模型中得到支持，國民黨的現任者對黨內競爭的嚇阻效果有限。「黨內分歧」有多重成因，並反映出不同的「選舉預期」。「選舉預期」是一個複雜的概念，由現任者優勢、選區政黨優勢、政黨分歧多因素所共同決定。從模型結果可推知，在民進黨內現任者確實具有相對正向的「選舉預期」的嚇阻效果（現任者具有優勢，黨內挑戰者少），相對地，國民黨內現任者面對初選分歧時，可能帶有負向的「選舉預期」（現任者優勢流失，黨內多人挑戰）。不過，當此初選分歧出現在政黨優勢選區時，也可能帶有正向的「選舉預期」的意義（政黨鐵票區，贏了初選就等於贏了大選）。

本文更進一步檢證了在政黨提名階段對大選的「選舉預期」（現任者優勢、選區優勢、黨內分歧），如何在大選階段兌現的假設。對於現任者而言，黨內初選分歧意味著現任者優勢受到挑戰，以及大選的預期劣勢，對於其大選得票率有負向影響。不過即使是現任者面對黨內挑戰，若同時身處優勢選區，則不必然對大選產生負向影響，因為此種分歧反映的是該選區具有選舉預期優勢。本研究透過模型的控制處理，發現對於國民兩黨，現任者優勢與選區政黨優勢有著不同的影響。對於國民黨而言，候選人多數挾政黨聲勢與選區政黨優勢來提高得票率，現任者遭遇黨內分歧對於大選的影響力相對有限。反之，民進黨的現任者優勢，以及其上次選舉的得票率，則對大選有著關鍵的影響。

整體而論，兩大黨的黨內分歧受到不同因素影響，而對大選有不同的作用。國民黨的現任者從初選到大選似乎並無明顯的「選舉預期」優勢，也沒有產生「嚇阻」黨內分歧的效果，相對地，政黨的選區優勢既刺激了初選的黨內

競爭，也提高大選的得票率。民進黨的現任者則是從初選便發揮了嚇阻黨內競爭的作用，不僅於黨內提名階段較少面對黨內分歧，在大選階段，那些沒有被黨內挑戰的現任者（選舉預期優勢）相對於面對黨內挑戰的現任者（選舉預期劣勢）更在得票上處於相對優勢。由本研究的理論推論與資料分析結果可見，政黨提名階段的黨內競爭，絕對不僅止於黨內的風暴，更是充斥著大選競爭的諸多玄機密碼。

本文作為探討初選黨內競爭對大選影響的初探性研究，仍有諸多研究限制。在研究的因果推論上，本文核心論證為提名黨內分歧如何影響大選，特別聚焦於現任者優勢與政黨優勢的選舉預期的影響。實際上影響政黨提名的黨內競爭以及大選黨際競爭的因素相當多，不論是第三黨的候選人、地方派系或家族勢力等的影響，然因為本文的研究乃是由理論假設推導所進行驗證，其他可能影響因素並未能完全納入。而在研究的分析層次以及變數的操作上，因為在區域選舉的單一選區下，候選人幾乎等同於選區，因此本研究模型雖採選區為分析單位，但很多選區變數的操作乃是由候選人個人認定（如現任者屆次與得票率），若能區辨個人層次與選區層次的不同因素的作用，在模型的推論上也可納入更多的因素分析。再者，在研究時間範圍上，本研究選擇選制改革後的2012與2016年兩屆立委單一選區的選舉來進行推論，然每次選舉存在動態差異，由兩屆資料所推論出的兩大黨競爭模式，是否能延伸到其他選舉與多黨化競爭，仍有待更多資料的檢證。也期待未來研究，能納入更不同因素的討論、不同分析層次變項操作的可能，以及擴大分析時間範圍對象，做更為細緻豐富與普遍性的驗證。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今日新聞編輯中心，2019，〈賴清德為何執意選總統？新系成員曝「2大關鍵原因」〉，今日新聞：<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319/3278216/>。2020/2/5。

王正寧，2011，〈政治長短調——立委提名 藍營維持現行辦法〉，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立委提名%20藍營維持現行辦法?chdtv>。2019/4/15。

王寓中，2011a，〈藍中市第八區 將徵召江啟臣〉，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479812>。2019/3/20。

王寓中，2011b，〈藍委提名 第二波週三通過〉，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490824>。2019/3/20。

王業立，2016，《比較選舉制度》（第七版），臺北：五南。

民主進步黨，2011，〈民主進步黨第十四屆第六次中執會新聞稿〉，民主進步黨：<https://www.dpp.org.tw/media/contents/3663>。2020/1/15。

民主進步黨，2015，〈民主進步黨第十六屆第七次中執會新聞稿〉，民主進步黨：<https://www.dpp.org.tw/media/contents/6388>。2020/1/15。

邱瀨唐，2017，〈林飛帆：某黨在臺南推西瓜都會當選〉，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132365>。2019/8/15。

俞振華，2018，〈變，或不變？2016年總統立委選舉主要政黨的候選人甄補機制〉，載於陳陸輝（編），《2016年臺灣大選：新民意與新挑戰》，頁25-52，臺北：五南。

施曉光，2015，〈國民黨總統提名作業辦法出爐 有「防磚待玉」條款〉，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280865>。2019/7/15。

陳世宗，2015，〈盧秀燕獲國民黨提名 角逐6連霸〉，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23000659-260107?chdtv>。2019/7/20。

楊毅，2015a，〈評鑑未過 紀國棟敗給顏寬恒〉，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29000430-260102?chdtv>。2019/7/20。

楊毅，2015b，〈藍立委提名 新增「5趴」條款〉，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藍立委提名%20新增「5趴」條款?chdtv>。2019/7/15。

管嫫媛，2011，〈參選爆炸 269人搶73席區域立委〉，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11126000788-260107?chdtv>。
2019/4/12。

二、英文部分

- Abramowitz, A. I., 1988. "Explaining Senate Election Outcom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2, pp. 385-403. doi:10.2307/1957392
- Alvarez, R. M., Canon, D. T., & Sellers, P., 1995. "The Impact of Primaries on General Election Outcomes in the U.S. House and Senate." *Social Science Working Paper*, No. 932. Division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asadena, CA: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Atkeson, L. R., 1998. "Divisive Primaries and General Election Outcomes: Another Look at Presidential Campaig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1, pp. 256-271. doi:10.2307/2991755
- Ban, P., Llaudet, E., & Snyder, J. M., Jr., 2016. "Challenger Quality and the Incumbency Advantage."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pp. 153-179. doi:10.1111/lsq.12109
- Bernstein, R. A., 1977. "Divisive Primaries Do Hurt: U.S. Senate Races, 1956-197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1, No. 2, pp. 540-545. doi:10.1017/S0003055400267440
- Born, R., 1981. "The Influence of House Primary Election Divisiveness on General Election Margins, 1962-76."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3, No. 3, pp. 640-661. doi:10.2307/2130630
- Carey, J. M., & Polga-Hecimovich, J., 2006. "Primary Elections and Candidate Strength in Latin Americ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8, No. 3, pp. 530-543. doi: 10.1111/j.1468-2508.2006.00443.x
- Carson, J. et al., 2012. "Constituency Congruency and Candidate Competition in Primary Elections for the U.S. House." *State Politics & Policy Quarterly*, Vol. 12, No. 2, pp.127-145.
- Cox, G. W., & Katz, J. N., 1996. "Why Did the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U.S. House Elections Grow?"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0, No. 2, pp. 478-497. doi:10.2307/2111633
- De Luca, M., Jones, M. P., & Tula, M. I., 2002. "Back Rooms or Ballot Boxes?: Can-

- didate Nomination in Argent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5, No. 4, pp. 413-436. doi:10.1177/0010414002035004002
- De Luca, M., & Venturino, F., 2017. “The Effects of Primaries on Electoral Performance: France and Ital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French Politics*, Vol. 15, No. 1, pp. 43-56. doi:10.1057/s41253-016-0007-4
- Fell, D., 2006. “Democratization of Candidate Selection in Taiwanese Political Partie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Vol. 13, No. 2, pp. 167-197. doi:10.6612/tjes.2006.13.02.167-198
- Fell, D., 2013. “Impact of Candidate Selection Systems on Election Results: Evidence from Taiwan before and after the Change in Electoral System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13, pp. 152-171. doi:10.1017/S0305741012001282
- Hacker, A., 1965. “Does a ‘Divisive’ Primary Harm a Candidate’s Election Cha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9, No. 1, pp. 105-110. doi:10.2307/1976124
- Hogan, R. E., 2003. “The Effects of Primary Divisiveness on General Election Outcomes in State Legislative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31, No. 1, pp. 27-47. doi:10.1177/1532673X02238578
- Ichino, N., & Nathan, N. L., 2013. “Do Primaries Improve Electoral Performance? Clientelism and Intra-Party Conflict in Ghan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7, No. 2, pp. 428-441. doi:10.1111/j.1540-5907.2012.00624.x
- Indriðason, I. H., & Kristinsson, G. H., 2015. “Primary Consequences: The Effects of Candidate Selection Through Party Primaries in Iceland.” *Party Politics*, Vol. 21, No. 4, pp. 565-576. doi:10.1177/1354068813487117
- Johnson, G. B., Petersheim, M.-J., & Wasson, J. T., 2010. “Divisive Primaries and Incumbent General Election Performance: Prospects and Costs in U.S. House Race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38, No. 5, pp. 931-55. doi:10.1177/1532673X09345823
- Kenney, P. J., & Rice, T. W., 1984. “The Effect of Primary Divisiveness in Gubernatorial and Senatorial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6, No. 3, pp. 904-915. doi:10.2307/2130861
- Kenney, P. J., & Rice, T. W., 198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isive Primaries and General Election Outcom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No. 1, pp. 31-44. doi:10.2307/2111323
- Key, V. O., 1964. *Politics, Parties, & Pressure Groups* (5th ed.).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 Lazarus, J., 2005.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nticipation of General Election Outcomes and Primary Election Divisivenes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 30, No. 3, pp. 435-461. doi:10.3162/036298005X201626
- Lengle, J. I., 1980. "Divisive Presidential Primaries and Party Electoral Prospects, 1932–1976."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Vol. 8, No. 3, pp. 261-277. doi:10.1177/1532673X8000800301
- Lengle, J. I., Owen, D., & Sonner, M. W., 1995. "Divisive Nominating Mechanisms and Democratic Party Electoral Prospec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7, No. 2, pp. 370-383. doi:10.2307/2960311
- Mayhew, D. R., 1974.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The Case of the Vanishing Marginals." *Polity*, Vol. 6, No. 3, pp. 295-317. doi:10.2307/3233931
- Pesonen, P., 1968. *An Election in Finland: Party Activities and Voter Reacti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iereson, J. E., & Smith, T. B., 1975. "Primary Divisiveness and General Election Success: A Re-Examin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37, No. 2, pp. 555-562. doi:10.1017/S0022381600041281
- Rahat, G., & Hazan, R. Y., 2001.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Party Politics*, Vol. 7, No. 3, pp. 297-322. doi:10.1177/1354068801007003003
- Ramiro, L., 2016. "Effects of Party Primaries on Electoral Performance: The Spanish Socialist Primaries in Local Elections." *Party Politics*, Vol. 22, No. 1, pp. 125-136. doi:10.1177/1354068813514884
- Romero, D. W., 2003. "Divisive Primaries and the House District Vote: A Pooled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31, No. 2, pp. 178-190. doi:10.1177/1532673X02250293
- Rush, M., 1969. *The Selection of Parliamentary Candidates*. London, UK: Nelson.
- Segura, G. M., & Nicholson, S. P., 1995. "Sequential Choices and Partisan Transitions in U.S. Senate Delegations: 1972–1988."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7, No. 1, pp. 86-100. doi:10.2307/2960272
- Serra, G., 2011. "Why Primaries? The Party's Tradeoff Between Policy and Valenc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23, No. 1, pp. 21-51. doi:10.1177/0951629810382805
- Southwell, P. L., 1986. "The Politics of Disgruntlement: Nonvoting and Defection among Supporters of Nomination Losers, 1968–1984." *Political Behavior*, Vol. 8, No. 1, pp. 81-95. doi:10.1007/BF00987593

- Stone, W. J., & Maisel, L. S., 2003. "The Not-So-Simple Calculus of Winning: Potential U.S. House Candidates' Nomination and General Election Prospec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5, No. 4, pp. 951-977. doi:10.1111/1468-2508.t01-1-00120
- Stone, W. J., Maisel, L. S., & Maestas, C. D., 2004. "Quality Counts: Extending the Strategic Politician Model of Incumbent Deter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8, No. 3, pp. 479-495. doi:10.1111/j.0092-5853.2004.00082.x
- Ware, A., 1979. "'Divisive' Primaries: The Important Ques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3, pp. 381-384. doi:10.1017/S0007123400001861
- Wu, C.-L., & Fell, D., 2001. "Taiwan's Party Primar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No. 1, pp. 23-45. doi:10.1017/S1468109901000123
- Yu, C.-H., Yu, E. C.-H., & Shoji, K., 2014. "Innovations of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Polling Primary and Kobo under the New Electoral Rules in Taiwan and Japan."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No. 4, pp. 635-659. doi:10.1017/S1468109914000280